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卢卡奇:1931-1945

徐 熙

内容提要 卢卡奇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往往被掩盖在他“哲学家”“美学家”的光环之下,然而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意义和地位,值得被关注和研究。1931-1945年是卢卡奇的重要转折期,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革命坚守的坚定时期,是他对理论答案寻找的关键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是卢卡奇文艺批评思想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的基础,是他的“总体论”理论,同时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特征。

关键词 卢卡奇 1931-1945(苏联时期) 伟大的现实主义 马克思主义

徐 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00086

1931年至1945年是卢卡奇相对远离政治,在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研究理论的时期。这十几年间,卢卡奇除了于1932年前后曾一度到柏林研究文学与哲学外,其余时间均在莫斯科,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埋头著述,是卢卡奇文艺批评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古典讽刺文学理论及其在自由美学的崩溃》(1932)、《艺术与客观真理》(1934)、《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与形式主义而作》(1936)、《历史小说》(1937)、《现实主义辩》(1938)、《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39)等。中外学界从这些论文、论著中不断提取有价值的片段来建构卢卡奇的哲学成就、美学思想和其他各种理论,同时也都基本认同这一时期卢卡奇受到马克思早期经典著作《巴黎手稿》(中译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影响,在各方面的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变化和突出的成就。因此,1930年代苏联时期的卢卡奇,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相对于卢卡奇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研究来说,中外学术界对卢卡奇的文艺批评思想研究明显薄弱。卢卡奇30年代在莫斯科的长期停留,30年代末期引发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击中了当时文艺理论家所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他前后期思想变化研究的莫大兴趣,也引起当时的中国学者对卢卡奇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把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文论语境以及卢卡奇文艺理论的关注点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就在一定意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12AZW003)阶段性成果。

义上成为研究卢卡奇文学理论的独特视角。

一、文学的形式及现实主义批评

通过对文学形式的追寻来重塑现代人与世界的整体性,是卢卡奇早期的文学批评核心思想,也是终其一生的艺术追求。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卢卡奇第一次明确地宣称:“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1]他认为,在文学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形式的演变,而非受制于时间性的作品内容。文学的形式背后隐藏着作家的世界观,并受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与制约。文学形式只有与时代的历史氛围相契合,才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源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研究文学形式流变的方法论基础,卢卡奇认同黑格尔关于不同历史哲学问题产生了不同艺术形式的观点,并将其进行改造,将源于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概念理论化,形成了卢卡奇自己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在“总体性”理论的框架之下,笔耕不辍地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学术探索,撰写了大量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批评论著。可以说,“总体性”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望,是卢卡奇一生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他的《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此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贯穿始终的思想脉络。

卢卡奇以文学形式为切入点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充分显示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学批评家风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文艺批评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的熏陶,当他发现德国古典哲学的古老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才能得到真正科学的解决时,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立志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将理论研究和学术建树作为他向社会宣战的思想武器。正如詹姆逊所言:“卢卡奇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者,恰恰是因为《小说理论》提出的叙事问题要求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2]

卢卡奇对自己文艺理论的坚守到了非常固执的地步。他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表述“把艺术的功能范围异常地狭隘化了,剥夺了它的无限性和普遍性,甚至这种表述包含了——有意或无意地,自愿或不自愿地——这样一种倾向,使艺术成为单纯完成切实的实践课题的婢女,由此不顾其特殊性而毫无保留地、全部地纳入社会日常实践的体系。”^[3]卢卡奇还对当时苏联(1934年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失误之处进行了冷静的反省和批判,他希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回到20年代的水平,他对斯大林时代“图解文学”给予否定,正是其对现实主义坚持人道主义准则的标志。卢卡奇还认为,文学的本质不应该是对外观世界的直观反映,而应该是一种与历史总体性相适应的“叙事”。然而在现代小说中,蔚为大观的却恰恰是以机械反映论为基础的、缺乏总体性视野的“描写”。叙述与描写,原本是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著作中两种常见的创作手法,然而卢卡奇却对叙述与描写做出了泾渭分明的界定,赋予它们截然不同的审美价值,成为鉴别现实主义作品和非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手段。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卢卡奇认为描写对叙事的僭越反映了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已然发生了改变。“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所写的是在严重危机中最后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描绘这个社会得以产生的复杂的规律性,描绘从衰败的旧社会到兴起的新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渡。他们本人都积极参与过这个产生过程的危机四伏的过渡。”^[4]在卢卡奇看来,叙述与描写这两种文学写作方法的对立,正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立的根本原因。

[1][2]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第22页。

[3]卢卡奇:《审美特性》第2卷,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4]《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对现实主义的情有独钟,是卢卡奇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1]。

卢卡奇一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问题作深入探讨,尤其在1930年代末期与表现主义者以及布莱希特的论争,成为现代西方文论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论争之一,其中涉及现实主义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的理论,在中国文艺批评领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卢卡奇在1938年第6期《言论》杂志上发表了《现实主义辩》一文,将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当代文学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公开反现实主义”或“假现实主义”;第二类是“由自然主义一直发展到超现实主义的所谓先锋派文学”,“其主要倾向是越来越露骨地远离现实主义,越来越有力地摧毁现实主义”;第三类则是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卢卡奇将西方现代主义看作自然主义的翻版,他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置于“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把继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同反法西斯斗争的客观现实要求联系起来。卢卡奇在这场论争中坚持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把握现实,而不能局限于描述直接经历的事物的表象。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客观整体性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论争,使得卢卡奇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和论争关系^[2]。

由此可见,虽然卢卡奇的文学批评思想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从30年代及后期文艺批评实践来看,“伟大的现实主义”思想还是一以贯之的。从1934年发表的《艺术与客观真理》,到1963年出版的两卷本《审美特性》,一个纲领性的思想贯穿始终,即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任何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

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30年代的完善与发展

现实主义在西方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而形成并演变,成为具有多层面、多角度涵义的文艺批评理论范畴。卢卡奇文艺批评以现实主义作为理论旗帜,在30年代苏联时期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著名论争中,卢卡奇坚守现实主义标准,奠定了他在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1. 卢卡奇的“现实主义”

卢卡奇对“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如前文所述,在卢卡奇早年的三部著作中,现实主义是以一种文学风格和创作手法而出现的,现实主义对于卢卡奇早期文艺批评来说,只是“形象地”描写生活的日常事件的一种风格而已。这一时期卢卡奇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内涵还停留在传统含义。1933年,卢卡奇正式回到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受邀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在这段时间,卢卡奇一方面反对“拉普”思想和普列汉诺夫的正统派思想,另一方面又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艺问题的一些书信(这也是卢卡奇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论的时期)。这一时期,卢卡奇还兼任《文学评论》的编辑,于是在他的文学批评作品中,已经有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说法。他在1932年所写的《古典讽刺文学理论及其在自由美学的崩溃》一文中,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方法只是“伟大文学的可能的种类之一”^[3]。而在此之后,在对表现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卢卡奇认为,要想否定表现主义,就必须抬高现实主义,他的“现实主义理论”逐渐由一种文学风格,转变为真实描写社会现实的艺术标准,因此可以说卢卡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成

[1]参见《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8页。

[2]参见《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3]《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型就在30年代这一时期^[1]。

卢卡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作为依据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就来自于恩格斯在1888年致英国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信中说：“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在信中把巴尔扎克的创作视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2]。卢卡奇认为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触及了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真正根基，那就是“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图景的这种无情态度，是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质标志”^[3]。

卢卡奇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础，正是他的“总体性”理论。卢卡奇之所以钟爱“总体性”，就在于他已经发现，当时科学技术已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物化已经使得感性范畴里的日常生活与日常思维具有一种普遍的片面性与虚假性。人的本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被割裂成碎片隐藏其中。简单、直接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只能是对物化现实一种变相的默许。卢卡奇坚持认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就这样把人和社 会当作完整的实体来加以描写，而不是仅仅表现他们的某一方面。”^[4]卢卡奇要求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以全面的总体性去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比如，他评价德国诗人贝歇尔时表示：“贝歇尔诗歌中的总体性质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一切都犹如滚滚的长河，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发展和斗争。”^[5]他评价高尔基作品时则认为：“在这里，高尔基在旧事物解体过程中看到了新事物诞生的阵痛，于是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宏伟的叙事形式，一种崭新的表现‘客观整体性’的方式。”^[6]

2. 卢卡奇文学批评思想的几组关键词

(1) 世界观与创作

卢卡奇在论述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也就恩格斯曾谈过的关于巴尔扎克作品中“现实主义的胜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对现实的狂热追求，或者用伦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作家的真诚和正直”。如上所述，在卢卡奇看来，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巴尔扎克，假使他所创造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在的艺术发展跟他本人最珍爱的偏见，甚至跟他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情^[7]。

(2)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卢卡奇认为，文艺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只有放在总的历史背景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和理解。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文学的美学本质、美学价值及其影响是普遍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他在《叙述与描写》中根据文学史上的事实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表现人的命运、人与人及物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分析指出，艺术创作离不开对社会运动的洞察力。在卢卡奇40年代所著《历史小说》中，他详细分析了法国的社会变动和转型带

[1]参见《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欧洲现实主义研究》英文版序，《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3]《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4]《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5]《贝歇尔的诗歌》，《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范大灿等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2页。

[6]《高特弗利特·凯勒》，《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卷，范大灿等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页。

[7]参见《欧洲现实主义研究》英文版序，《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页。

来的文艺形式与内容的变迁,分析了英德两国历史主义与历史小说兴起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因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而产生的分岔的文艺道路。因此卢卡奇认为,人的内在生命的基本倾向和主要矛盾,只能从他们社会及历史有机的关联中描绘出来,人类的行动、思维和情感,与社会生活以及奋斗目标密不可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艺术家也不例外。艺术家正是从社会生活现实里,获取材料和灵感,并表现出他所认识的人生与社会现象^[1]。

(3) 典型性问题

卢卡奇从哲学认识论角度与现实主义的实践角度,运用一些具体的例证对典型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乃是典型,这是将人物与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卢卡奇认为,典型是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审美体现,高尔基《母亲》中的典型人物尼洛芙娜就是这样,尼洛芙娜的形象是具体、生动、可感的,同时也反映出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即工人阶级必将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后来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实行的伟大的道路,这典型的革命的道路是在一种深刻的、个人的并充满着个人活力的生活中被描画出来了。”^[2]在谈到“典型”概念的规定性时,他说使典型成为典型的并不是它的一般性质,也不是它的纯粹个别的本质,使典型成为典型的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的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卢卡奇在谈到典型的塑造时认为,典型形象不是平均的形象,也不是怪僻的形象,典型形象之所以成为典型是因为它的个性。内部的本质受着客观上属于社会重要发展倾向的规则所左右和限定,只有通过最普遍的社会客观性而从个性的最真实的深处生长起来,一个真正的典型才能在文学上产生。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范畴和标准是典型,那么典型便和人的完整性是统一的,典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美学形式,对恢复人的完整性起到了积极巨大的作用^[3]。

三、30年代卢卡奇文艺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典型特征

卢卡奇的文艺批评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一直坚守“文学和艺术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性论”。卢卡奇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从青年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到后来一直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他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1930年,德国哲学家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答辩中,首次把自己同卢卡奇等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声明这是“共产国际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柯尔施的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事实^[4]。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再次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称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庞蒂在此书中,专章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将其源头追溯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明确地把卢卡奇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使《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尽管卢卡奇本人对此曾经提出过强烈的不满与抗议,但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

[1]参见《叙述与描写》,《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8页;《历史小说中新人道主义发展的远景》,《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66页。

[2]《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3]参见《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186页。

[4]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注17。

基人的观念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固化下来。

事实上,卢卡奇坚守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反对机械反映论,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客观本质的联系,拒绝臣服于当时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可以从其1930年代及前后的文艺批评作品中一探究竟。卢卡奇早在《小说理论》结尾处就写到:小说向史诗转化的条件不在于作家的个人意志,而是取决于社会和世界的转化。只要现代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新的史诗就无法出现。我们可以认为,就在这里,卢卡奇从思辨的形而上学走向了文艺的社会学分析,也从这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思想、历史观、物化观、阶级意识的阐述,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概念同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概念有着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卢卡奇认为,物化不仅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对于卢卡奇所坚守的“总体性”思想来源于黑格尔哲学,一个佐证是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过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他认为“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客观存在和对象上去,任何事物和对象就不再是孤立、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有机联系的整体”^[1]。

30年代苏联时期,卢卡奇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接触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著作,对反映论原理有了深刻理解。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对外在世界的任何感知仅仅是那不依赖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现实,在人的思想观念、感觉等中的反映。他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在存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这个最一般的原则问题上,是与任何一种唯物主义相符,而与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及其变种尖锐对立的,但自然地,它也与机械唯物主义有着鲜明的区别^[2]。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是辩证的反映论在美学领域中的应用”^[3]。卢卡奇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文艺批评的武器。他曾这样写到:“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在文学领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帮助揭示出和解释清楚那些最符合阶级斗争问题的创作方法,并使它们的文学效果得以实现。”^[4]卢卡奇在总结进步文艺工作者出现的失误和教训时,往往将他们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看作是根本原因。他在谈到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时指出:一些理论家错误地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与革命民主主义的有机联系,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当然能帮助每个重要的和正直的思想家在思想上克服这些问题”^[5]。

卢卡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文学艺术,指出:“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基础中看到了规定方向的原则,看到了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此相联系,各种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仅仅是起着次要决定作用的上层建筑。”^[6]卢卡奇将文学艺术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在进行文艺批评时,总是将所评论的作家、作品及文艺思潮,同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联系起来,从而探寻所评对象的实质及其产生原因。卢卡奇在其研究德国文学史的重要论文《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中,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文学史研究脱离时代的历史,而仅仅以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文学史的做法。他指出:“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文学史是行不通的。把时代和历史的倾向孤立起来,然后再归入诸如感情

[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291页。

[3][5][6]《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第102页,第275页。

[4]《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68页。

和理智等心理学上的情结,那是不可能确定它们的特征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把这样一些情结变成了神秘的概念,这种虚伪的具体性只能扩大思想混乱。”^[1]

四、结 语

卢卡奇 24 岁时撰写《现代戏剧发展史》夺得克丽丝丁娜文学奖,此后他又写了《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其中《心灵与形式》被推崇为现代存在主义的先声,《小说理论》则是同代人眼中“精神科学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物”,也是第一部真正将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文学形式加以系统研究的文论著作。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卢卡奇开始了全面持久的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对现实主义文学予以了崇高的地位,并且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开始了对现实主义文学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写下了包括《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德国近代文学史概述》、《歌德和他的时代》、《历史小说》以及《现实主义问题》在内的大量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论著,最后终以两卷本的《审美特性》实现了半个多世纪学术探索的最后的辉煌,卢卡奇也因此得到了“美学方面的马克思”的称号。

卢卡奇所身处的 20 世纪是一个多种思潮并存和交互冲突的时代。纵观他的文艺批评作品,可见既有贯穿始终的现实主义,也有其他种类繁多的思想,主要源于西方哲学思潮对他的重大影响和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贵理论探索。30 年代苏联时期,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把文学批评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和讨论。40 年代以后,西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异化的登峰造极,使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不得不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来应对。他以“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为盾,来抵制一切在他看来可能会加剧总体生活破碎的文学思潮,批评自然主义和以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卢卡奇给予我们的是他文艺批评理论中的众多创见,对其后的文学批评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责任编辑:平 啸]

Lukacs as a Literary Criticist: 1931-1945

Xu Xi

Abstract: Lukacs's status as a literary criticist tends to be overshadowed by his status as a philosopher and aesthetician. However, his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in literary theory is worthy of concern and study. The period of 1931-1945 is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for Lukacs when he converted to a Marxist by sticking to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ought for an answer in theory. "Great realism" is the core concept in Lukacs's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based on his theory of "totality" and reflec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Lukacs; 1931-1945 (the Soviet Union period); great realism; Marxism

[1]《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 页。